

# 代际互惠还是福利不足？ ——城市双职工家庭家务劳动中的代际交换与社会性别

陶艳兰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关键词 老年女性 双职工家庭 家务劳动 性别

摘要 老人帮助已婚儿女承担家务劳动,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种代际互惠。第一,在代际及性别权力关系改变与工业社会变迁相互作用的背景下,这种传统意义上的代际互惠发生了改变。第二,代际互惠观念背后隐藏了一些意识形态,它们与工业化进程中家庭功能外移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文章在父系家庭和工业社会变迁的理论框架下,从代际和性别权力关系的视角,着重分析了城市双职工家庭中,在第一个孩子出世到上小学之前这段家庭生命周期内,祖父母特别是祖母协助双职工家庭中的儿子和儿媳承担育儿及其他家务工作这一现象,探讨了在经济力量改变社会性别和父权制家庭关系的背景下,老年女性的福利遭到削减、家庭面临工业化挑战、社会政策被期待做出调整等相关问题。

中图分类号 C913.11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4-2563(2011)04-0013-07

## Intergenerational Reciprocal Care or Welfare Default? ——Gender and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of Care in Domestic Labor in Dual-earner Families

TAO Yan-lan

(School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at th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Jiangsu Province, China)

**Keywords:** elderly women, dual-earner families, domestic labor, gender

**Abstract:** This paper asserts that elderly women helping their sons and daughters-in-law with domestic labor cannot be simply viewed as a kind of intergenerational reciprocal care. Firstly, in the interplay of chan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and gender relationships as well as in society,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intergenerational reciprocal care also changes in varying degrees. Secondly, the paper identifies an implicit assumption underlining the view of intergenerational reciprocal care with respect to housework, which contradicts the outward extension of family functions in industrialization. This paper adopts a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and gender power relationships to examine the phenomenon of elderlies assisting their sons and daughters-in-laws, who are both engaged in gainful employment, with the rearing of the first child from birth to going into schooling. From a perspective of patrilineal famili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society,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economic forces change gender and patriarchal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how elderly women's welfare is shortchanged therein. This discussion shall point out that social policy is expected to adjust to the needs of family and working wome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welfare of elderly women.

###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在这样巨大的变迁面前,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也正经历极大的压力和蜕变,从家务劳动这一日常生活细节看去便

知一二。目前,中国城市家庭一般都是双职工家庭,女性在婚前就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结婚生子之后依然要继续工作,已婚男性难以一人承担家庭开支,女性生子后出于育儿和照顾家庭的目的而做全职太

太者少之又少。而此时,托儿及家务劳动社会化体系在中国城市还不十分完善,育儿及家务活还得主要在家庭内部解决。家务劳动成为双职工家庭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孩子还年幼的年轻夫妇身上,父母尤其是母亲协助双职工家庭带孩子做家务的现象非常普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社会学界对家务劳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家务分工的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sup>[1][2][3]</sup>二是家务劳动的性别化及其导致的公平感、婚姻满意度、职业妇女的角色压力等问题,<sup>[4][5]</sup>除此之外,有学者以家务劳动为例,探讨了女性群体的内部差异。<sup>[6]</sup>还有学者分析了外出务工背景下的夫妻资源对女性家务分工期望的影响机制。<sup>[7]</sup>整体来看,社会学对家务劳动的关注和研究较少,各研究之间少有对话,连续性不是很强。具体来讲,不足之处有以下几点:第一,较少结合具体的家庭生命周期。以往的研究一般都是从整体上来讨论家务分工,事实上,家庭在不同的生命周期,家务劳动的压力是不一样的。第二,较少考虑到很多的家务劳动是由家庭中的老年女性来承担的。学术界将较多的目光集中在夫妻之间的家务分工,由此讨论家务分工的性别问题及对女性职业和婚姻的影响。而对老年女性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养老及照顾需求方面,这诚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不可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当前,在一部分老年女性的生命历程中,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帮忙带孙辈做家务。城市家庭中,依然有很多家务工作是由老人特别是女性老人来承担的。特别是在家庭中第一个孩子出生到孩子上小学这段时间,老人带小孩承担家务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段时间内家务分工的逻辑又是什么呢?第三,深入的解释略显不足,许多的定量研究无法说明,劳动分工的差异为什么存在或怎样存在。严海蓉采用质性方法分析了内置于家务劳动中的性别与阶级问题,<sup>[8]</sup>其中关于家务劳动的性别意涵给了本文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为什么老人帮忙带孩子做家务这种普通寻常的现象值得关注呢?这看起来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三代同堂,互相照应,尽显中国传统家庭的温情。可是事实并不尽如此。正如郭于华在对华北农村养老

问题的研究中所提出的,传统家庭代际交换逻辑的运作需要有与之匹配的文化和制度环境。<sup>[9]</sup>本文认为,老人承担儿女的家务劳动,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种代际互惠。本文拟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一问题:第一,传统的代际互惠的程度和方式发生了改变;第二,这种代际互惠的话语中隐藏了几种意识形态。文章的理论框架是父系家庭和工业社会变迁,将从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脉络中理解和分析家务劳动的代际转移。文化结构,指的是父系家庭价值规范。要诠释中国家庭的各种关系一定不能离开文化因素,否则只能在西方工业化理论框架的凝视下进行复制工作。社会结构,指的是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及变迁。文章着重分析,城市双职工家庭中,在第一个孩子出世到上小学之前这段家庭生命周期内,祖父母特别是祖母协助双职工家庭中的儿子和儿媳承担育儿及其他家务工作。文章将这一现象置于代际和性别权力以及社会政策的框架之内进行分析,经济力量正在改变社会性别和父权制的家庭关系,家庭在应对工业化挑战的过程中期待社会政策能做出调整。

## 二、代际权力转移导致互惠程度的变化

在从夫居的中国社会中,祖父母带小孩做家务在很大层面会被看成是理所当然,它是一种代际支持和代际互惠。中国人最初的和最终的责任是对祖先和后代尽心尽力。<sup>[10](P53)</sup>这种深层的文化框架给了我们对于祖父母角色认知的理由和依据。父亲晚年会得到儿子的孝敬和赡养,是因为父亲一生都在为儿子付出,女性在父系家庭中忍气吞声做“小媳妇”,但只要她有了儿子,总有“熬成婆”的那一天,等到她老了,也会有媳妇来照顾她。在代际交换中,权力没有下移,父亲仍拥有权威,母亲也由性别弱势向辈分和年龄优势转变。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代际之间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一文化框架难以解释今日工业社会中的家庭代际现象。研究这一问题的文献较多,研究者们比较共同的想法是,随着家庭日趋小型化和核心化,家庭关系的主轴已从纵向的强调亲子、血缘关系转向横向的夫妻和姻缘关系,传统的父系父权制在中国已失去存在的基础,<sup>[11][12]</sup>与上一代权力消减相对应的是,下代的权力和权利得到了较大

程度的提高。<sup>[13]</sup>在本文的脉络中,这种代际权力转移趋势下,代际互惠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第一,资源代际分配方面,代际权力下移意味着要以儿子儿媳及孙辈的需要和利益为优先。在传统农业社会,帮助儿子立业成家是父母人生中最大的职责之一,儿子对父辈的服从和赡养就是对这种付出的回报。在工业化过程中,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在资源的代际分配模式方面,呈现出轻老重幼的现象。当前城市家庭一般只养育一个孩子,科学育儿理念正逐渐普及,育儿投入开支较大,城市生活成本高昂,双职工夫妇时间宝贵,因此,老人从儿子处获得的经济资源和精神资源皆有限。老人协助子女带小孩做家务,子代家庭的需要得到满足了,但是老人的需要明显不受重视或难以得到满足。沈奕斐研究了当前中国家庭结构变化趋势,她用翔实丰富的案例表明了城市双职工家庭中祖父母几乎承担了所有家务,一切配合儿子、儿媳及孙辈的生活工作安排,饭菜以儿子儿媳口味和喜好为标准,隐藏自己的喜好,压抑自己的需要,扮演着完美“妻子”的角色。<sup>[14]</sup>  
(P149-153)陈皆明研究了代际互惠原则的实施机制,他从父母为寻求老年安全所采取的策略出发,讨论了父母对子女投资与子女提供帮助之间的关系。经济利益和情感因素合二为一,是中国家庭具有较高凝聚力的原因。<sup>[15]</sup>这一分析路径提供了认识代际关系的新视角,但是老人的体验比较受忽视。在劳动分工认知方面,一些职业女性认为老人承担家务工作是理所当然的。老人付出了劳动,却较少得到情绪支持,这些导致老人对日后的生活充满了焦虑:儿子儿媳现在连带孩子做家务的时间几乎都没有,将来等老了动不得,能指望他们照顾我于床头榻前,因此现在的投资对获得将来的回报是不确定的。在亲身经历的事实面前,他们对代际互惠产生了质疑。康岚通过研究指出,中国城市代际关系新模式,由于子代个人意识兴起,代际权利义务失衡,子代从代际关系中获得经济和劳务资源,而亲代希望从代际关系中获得的情感满足存在缺陷。<sup>[16]</sup>  
(P138)本文通过分析也认为,老人承担大量的家务工作,子代家庭的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的确得以减轻,但是老人的福利却遭到减损。

第二,家庭决策方面,代际权力下移意味着家庭事务的处理方式由儿子儿媳做主。在工业化进程中,家庭关系的主轴发生变化,从重视亲子关系的纵向关系转为重视夫妻关系的横向关系。祖父母在很多事务上失去决策权甚至参与权和发言权。沈奕斐在经验材料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到上海和子女生活在一起,对男性老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仅要习惯不做一家之主,而且也要学习干家务。小家庭需要的是一个能干的或没有主见的“妻子”,而不是想做主的“丈夫”。<sup>[14]</sup>  
(P166)在本文的脉络中,代际权力下移的表现是,老人一般只需要负责协助带小孩和做家务,不需要对其他家庭事务做决定甚至发表意见。同时,育儿和家务劳动方式基本上由儿子儿媳做主。这意味着,老人基本上要遵照子代的要求和标准做家务事带孩子。而今城市中的育儿环境、要求和理念,与老人的储备知识大为不同,这一切他们都要重新去适应。这些也成为两代女性之间矛盾冲突的焦点。来自婆婆的抱怨一般是,帮她做了还嫌不好;来自媳妇的叨念是,婆婆带孩子的方式不科学。以儿子儿媳为主导的幼儿养育方式、家务工作方式,让老人觉得自己的重要性和价值降低,付出劳动的同时得不到权威和尊重。由此可见,祖孙三代同堂的城市双职工家庭中,老人不全是享有天伦之乐的祖父母,很多时候也是承担繁重家务事的“老妈子”。

从以上两方面的分析来看,在代际权力关系转移的背景下,老人在承担大量家务工作的同时还要承受失落与焦虑的折磨,得不到情绪支持和价值肯定,生活健康和精神福利受到损害。相较而言,子代受惠多于父辈受惠,代际之间的互惠程度不同。

### 三、性别权力关系变化导致互惠模式的改变

女性进入劳动市场,获得一定的经济独立,这意味着增加了与丈夫之间协商的筹码,家庭地位得以提高。职业女性家庭地位提高改变了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结构。她们要继续提升或巩固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力,最先遇到的难题来自婆婆。女性内部权力关系变动由此延展开来。沃尔夫(Margery Wolf)在针对女性生命经验的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子宫家庭”的概念,用它来解释女性在父系家庭中的活动和状态。为了巩固在夫家的地位,女性认同父



系家庭价值,生子是其最大的人生目标之一,在生了儿子之后,就把所有的期待都放在儿子身上,待儿子结婚以后,通过受苦母亲的形象操控儿子的情感,以达到控制媳妇的目的,最终维持自己在父系家庭中的位置。<sup>[17]</sup>许烺光也认为,母亲对成年的儿子有着很大的支配权力,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因为儿子对母亲欠下了巨大的生理债务,即母亲的怀孕、分娩与哺乳。<sup>[10][P33]</sup>最后一代传统婆婆<sup>①</sup>,还抱有农业社会媳妇熬成婆的权力想象,应该是媳妇带孩子做家务,她们劳碌了一辈子该享儿孙绕膝的天伦了。但是儿媳和儿子一样,每天早出晚归,有的甚至还要忙过儿子,这一情景超出了她们的想象。职业女性家庭地位提高,婆婆还存有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权力想象。这种情况下,代际互惠会受到何种影响呢?

第一,婆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及其影响。面对儿媳家庭地位的上升,原本处于辈分和年龄优势的婆婆,内心难免有巨大的落差。在一些情形下,她们会通过操控儿子的情感来试图挽回在家庭中的地位,争取养老资源。而儿媳也有资源与婆婆抗衡,那便是与丈夫自由恋爱后获得的夫妻感情。婆婆紧张就在女性内部权力关系转变中微妙地呈现着。看似和谐的祖孙三代同堂的家庭中,实则充满着看不见的硝烟。从这个角度来看,父辈协助子代承担育儿及家务劳动,在婆媳之间的权力较量中,代际互惠受到影响。

第二,代际互惠到底受到何种影响,部分取决于祖父母的经济状况。经济依赖型祖父母几乎无法享受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代际互惠模式,即在儿子成家后享受儿媳的孝敬和照顾,在儿媳从事全职工作的情况下,他们扮演起传统的“妻子”角色照顾儿子儿媳的家庭,通过这种付出换取将来的养老资源,“养儿防老”变成“养孙防老”。但是临老时受到怎样的照顾是不太确定的,他们可能被送进养老机构或被陌生人照顾。经济独立型祖父母不会“臣服”于挣钱养家的儿媳。他们因为经济条件较好,并无太多养老焦虑,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自己的老年生活。经济上的保障,加之若能够接受社会化或市场化的养老方式,祖父母便有可能不会承担儿子儿媳在育儿

阶段繁重的家务劳动,也可能只带孩子不做家务。他们是否会参与儿子媳妇的家务和育儿工作取决于他们的自主性,不会将这些工作看成是自己的义务。经济独立使得他们自主而有尊严的生活成为可能。虽然他们不可能像传统农业社会那样享有对儿媳的控制权,但至少他们可以独立自主,不会被儿媳所控制。经济独立型祖父母不需要通过家务劳动来换取养老资源,代际互惠的链条出现一定程度的脱节。

第三,受婆媳矛盾或经济独立型祖父母自主性的影响,职业女性会请自己的母亲来帮忙照顾孩子和家庭。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孩子随父姓,奶奶带小孩是常见的和被接受的,而外婆带小孩则不被接受,但是在今日工业社会,城市双职工家庭中由外婆带小孩的现象逐渐增多。林津如认为,这是职业女性家庭地位提升所致,她们通过联络娘家资源来抗衡父系家庭结构;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它显示了已婚女儿的价值和重要性,她们与起源家庭即娘家的联系并未止于出嫁,反而因为婚姻,为了反抗父系亲属,更贴近娘家,意外地使无经济能力的老年女性在父系家庭婆媳关系的失落中得到补偿。<sup>[18][P1-74]</sup>国内家庭社会学领域很多的经验研究都从不同方面验证了现代化理论关于父系制向双系并重发展的预设。<sup>[19]</sup><sup>[11]</sup>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们的性别观念,但是从老年人的角度来看,为儿子付出一切不一定有预期的回报,儿子不见得会养老,反而有可能与儿媳的娘家在一起。姻亲成员参与代际交换,传统的代际互惠模式随之发生改变。

从以上三方面的分析来看,职业女性性别地位的提高导致代际关系模式发生变化,产生了3个可能性的结果,其一,祖父母可能被排斥在带小孩和协助做家务之外,姻亲成员参与代际交换,传统的代际互惠模式发生改变。其二,经济依赖型祖父母扮演传统“媳妇”角色照顾儿子儿媳家庭,传统代际互惠模式发生了方向上的改变。其三,经济独立型祖父母的权力并未因为儿媳家庭权力的提升而减弱,他们在协助承担儿子儿媳的家务劳动和育儿方面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传统的代际互惠链条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脱节。总之,性别权力关系变化影响了代际互

①这一表述参见笑冬发表在《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最后一代传统婆婆?”一文。

惠模式。

#### 四、代际互惠背后的意识形态

将祖父母带小孩做家务看成是理所当然或家庭互惠的观点,其实蕴含了几种明显的意识形态。在工业社会,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家庭功能外移,这些意识形态不利于老年女性及双职家庭福利需要的满足。

第一,育儿及家务活是家庭内部的事情。在传统农业社会,它们的确是家庭内部的事情,农业社会扩大家庭的功能能够满足家庭这方面的需要。但是进入工业社会,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流动和迁移导致家庭规模变小,以及代际之间在地理上的分离,原本属于传统大家庭的事务,工业社会中的小家庭难以应付。这一意识形态没有随着工业化进程及时发生改变,导致中国工业化的社会成本部分地转嫁到家庭中老年女性身上。目前,政府和学术界一谈到老年人,恐怕就会想到他们作为依赖型人群,在医疗和养老方面给社会带来的负担。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这固然是事实,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老年女性给社会做出的默默无闻的贡献。国家将重要的社会问题家庭化及私人化,造成了老年女性生活品质和福利的降低。在工业化浪潮对家庭袭击的过程中,创造出亲密的家庭关系,保证老人的自主、尊严与生活品质,减少代际之间的干扰,这可能是传统家庭伦理在工业化社会中可以改变的方向。老人因各种原因无法给儿媳带孩子做家务的情况下,双职工家庭特别是职业女性就面临极大压力,由于没有弹性工作时间,他们可能会频繁地更换保姆,婴幼儿处于不太有利的养育环境之中。另外,在特定的家庭生命周期中,职业女性能够持续就业,看似中国的家庭制度与工作制度之间连接完好,但其实,老年女性在这一过程中做出了较大的牺牲。因此,可以说,在代际互惠的背后,还隐藏了家庭与工作之间在制度上的断裂,现行的工作制度几乎不考虑个人在家庭与工作之间的联系,将家庭与工作完全分开,强化了性别差异分工的结构因素。

第二,育儿及家务劳动是女性的事情。随着生育控制和生育观念及个人价值观的改变,加之市场经济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与传统社会中的女性相比,

现代女性部分地从怀孕、生产及哺乳到再怀孕这一循环的“生理暴政”中解放出来,她们大量进入劳动市场,拥有与男性一样的全职工作。在这一事实面前,职业女性如何能够同时完全兼顾育儿和家务工作?托儿和家政服务体系不足,服务质量存在问题,加之工业化初期阶段,普通工薪家庭收入不高,它们并不能完全支付这方面的服务费用。因此,家务劳动还是较多地转移到家庭中的老年女性那里。女性就业和参与社会被看成是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重要指标之一,但是,从本文的分析视角来看,女性获得的经济独立和社会地位,是以另外一部分在家庭和社会上均弱势的老年女性的劳动付出为代价的。实质上,家务劳动代际转移是通过压迫经济上弱势的老年女性来造福经济上占优势的女性,并没有改变家务劳动分工性别化的特点。近期也有研究发现,虽然女性外出工作确实可以减少女性的家务工作,但女性工作所带来的资源并无法换来男性在家务方面的参与,女性家务工作的减少是通过在市场中以金钱交换的方式达到的。<sup>[20](P796-805)</sup>在本文的脉络中,职业女性家务劳动的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中国家庭代际间惊人的凝聚力达到的。进一步分析,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从生命历程的角度来看,婆婆总有做不动家务的那一天,老年的照护又由谁来承担呢?目前,中国城市的社会化养老体系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加之人口老龄化来势汹汹,老年人口数量庞大,家庭化照顾方式难以短时期内改变。老人高龄时期的照顾很有可能是由职业女性来承担。因此,从家庭生命周期的动态角度来看,婆婆与媳妇,各有各的压力。最后一代传统婆婆是令人哀叹的,第一代现代媳妇的福利同时会遭到减损。再进一步分析,就算顾及老年女性的福利而做出政策调整,双职家庭对育儿及家务劳动的人力需求是有增无减,那么又将会是什么人来从事这样的工作呢?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情况来看,依然会是那些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处于弱势的女性来承担。家务劳动中内置的性别问题一直没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第三,家务劳动不具有社会价值。家务劳动在很多人眼中是没有价值的。一些学者在界定家务劳动的概念时,考虑到了它所包含的亲情和爱的面向,认

为它是一种看不见的付出,包含了承担家务的家庭成员对其他家庭成员的爱和关怀。一些女性表示自己愿意做家务,便与对这种观念的认同分不开。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工业化社会中对待家务劳动的观点的分化。只要稍有可能,一些职业女性就希望从繁琐、重复、低价值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转而去职场寻求能够体现她们价值的机会。家庭与工作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家庭内部的事务被看成是非生产性的,是一种负担,承担家务工作的群体势必不被关注和重视。这种价值倾向不利于家务劳动社会化。中国家政工作的发展一直很缓慢,这与主流社会对家务劳动的定位和认识不无关系。中国台湾的家务工作者表示,在家带小孩及做家事,应有经济收入,而不是免费的义务。因此,若欲委托家中老年妇女照顾家务及小孩,必得顾及其体力负荷,也应尽可能地给付合理的酬劳。<sup>[21](P144)</sup>这是中国台湾家务工作者对提升家务工作社会价值的一些呼吁。研究中国家务劳动问题的学者也提出了相同问题。严海蓉认为,雇佣家务劳动中存在阶级问题,也存在性别问题,那些可以依靠性别替身来解决家务问题的职业女性没有从话语中解放出来。任何对家务劳动的讨论都必须正视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并且通过性别问题和阶级问题的关联来寻求解放性的方案。<sup>[8]</sup>因此重新界定和认识家务劳动很重要,关乎老年女性的福利和家务分工中的性别平等。

## 五、小结与讨论 社会政策与性别文化的重整

本文分析了家务劳动代际转移这一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及代际与性别权力关系的变化。代际权力下移,职业女性家庭地位提高,这两点都不利于老年女性在父系家庭中生命意义的延续。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老年女性仍然还要忙于儿子儿媳家的屋里灶台,作为最后一代传统婆婆,她们的生活很无奈。本文通过分析认为,大可不必将老年女性带孩子做家务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家庭互惠互助。由于代际权力及性别权力的改变,这种代际互惠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背后隐藏了老年女性的辛劳和焦虑,职业女性的矛盾和困惑,以及双职工家庭的压力。老年女性、职业女性及双职工家庭的生活品质和福利同时都有可能遭到损害。不能将问题的焦点置

于家庭内部,指责儿子儿媳的不孝顺、提倡家庭和谐的传统价值等。这是问题的一方面,我们更应该看到,在社会转型中,个人问题不仅仅是家庭内部问题,家庭问题也不能仅仅由个人来承担,国家因素应该被考虑进来。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女性参与市场劳动保障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在宏观方面来看,出台了保护职业女性的相关政策。例如,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9号令出台了《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明确规定了女职工的 special 保护。在私人领域方面,托儿服务和老人照顾体系也在逐渐建立。但是,一些法规的可操作性和执行力度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托儿服务和老人照顾体系方面也存在较多的问题。保证女性就业,育儿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趋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对家庭已经发起了各种挑战,在育儿和家务劳动领域,隐含着强大的性别化和家庭化的意识形态,而这一意识形态严重地削减了职业女性和老年女性的福利。如若这些意识形态不发生改变,女性依然难以从传统的性别规范中解放出来。正如布贝克(Bubeck,DE)所指出的,当代女性虽然已从事带薪全职工作,但是强制的性别分工使女性仍然陷入一种照顾循环的漩涡中,这才是影响当代性别地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他认为,照顾循环是照顾工作的实践、照顾伦理与意识形态共同构成的结构丛,它们彼此之间有增强作用。<sup>[22]</sup>国内外一些文献很多都聚焦于个人层面的时间可得性、相对资源与性别观念对家务分工的影响。福和真子(Makiko Fuwa)比较分析了22个工业化国家的家务分工情况,认为,宏观层面的性别不平等可能会导致这些个人层面因素在家务分工上影响作用的消减。在那些宏观层面性别不平等的国家,女性很少能够从个人资源的优势中获益。女性个人因素的提升并不足以改变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状况。宏观层面的因素还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性别规范和福利体制。<sup>[23](P751-767)</sup>由此看来,国家因素和性别文化对家务分工有很大影响,单看妇女就业及经济地位提升不足以对家务分工问题有全面的认



识。期待着国家通过一些福利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促进家务分工上性别文化的调整。比如,在夫妻双方的生育假期的规定上再做出更多的调整;通过共同参与育儿与家务劳动的制度设计,使男女都能承担就业和家庭照顾工作。这不仅是孩子和家庭受益,也将对性别平等产生潜在的影响。徐安琪、张亮在实证资料的基础上,探讨了父亲参与育儿的意愿、行为、体验、效用及影响机制等方面的内容,<sup>[24][25][26]</sup>为这方面政策的调整提出了一定的理论依据。除此之外,还可

以在一些工作场所附近建立日托中心,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照顾场所临近父母工作场所是实施高质量照顾孩子项目的重要条件。<sup>[27](P301)</sup>虽然从总体来看,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还比较低,但是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大城市中,工业化水平较高,市民的经济收入也较高,能够支付由政府与企业提供的育儿与其他一些家务劳动服务。在社会政策制定方面要考虑到地区差异需求。

### [参考文献]

- [1]王亚林.城镇居民家务劳动动态考察[J].社会学研究,1991,(3).
- [2]杨菊华.从家务分工看私人空间的性别界限[J].妇女研究论丛,2006,(5).
- [3]叶苏,叶文振.人口流动与家务分工——以厦门市流动人口为例[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2).
- [4]徐安琪,刘汶蓉.家务分配及其公平性——上海市的经验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3,(3).
- [5]杜学元,陈金华.论家务劳动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及解决对策[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10,(2).
- [6]李芬.关注女性群体内部差异——以家务劳动时间研究为例[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8,(1).
- [7]李亮,杨雪燕.外出务工背景下夫妻资源对农村女性家务分工期望的影响——基于巢湖市居巢区的实证研究[J].社会,2009,(2).
- [8]严海蓉.阶级的言说和改造——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级[J].开放时代,2010,(6).
- [9]郭于华.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模式的分析[J].中国学术,2001,(4).
- [10]许烺光.宗族·种姓·俱乐部[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 [11]杨善华.沈崇麟.城乡家庭——市场经济与非农化背景下的变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 [12]徐安琪.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1,(2).
- [13]王金玲.非农化与农民家庭观念的变迁[J].社会学研究,1996,(4).
- [14]沈奕斐.个体化与家庭结构关系的重构——以上海为例[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 [15]陈皆明.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1998,(6).
- [16]康岚.反馈模式的变迁——代差视野下的城市代际关系研究[D].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 [17]Magrery Wolf.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18]林津如.父系家庭与女性差异认同:中产阶级职业妇女家务分工经验的跨世代比较[J].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7,(68).
- [19]阎云翔.家庭政治中的金钱与道义:北方农村分家模式的人类学分析[J].社会学研究,1998,(6).
- [20]Treas, J. & Ruijter, E. de. Earnings and Expenditures on Household Services in Married and Cohabiting Unions[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8,(70).
- [21]林津如.外佣政策与女人之战:女性主义策略再思考[J].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0,(39).
- [22]Bubeck, Diemut E.. *Care, Gender and Justice*[M]. Clarendon Press. Oxford,1995.
- [23]Makiko Fuwa. Macro-level Gender Inequality and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in 22 Countrie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4,(69).
- [24]徐安琪,张亮.农村父亲的亲职参与意愿、行为与体验——上海郊县的经验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3).
- [25]徐安琪,张亮.父职参与对孩子的效用:一个生态系统论的视角[J].青年研究,2008,(9).
- [26]徐安琪,张亮.父亲育儿投入的影响因素:本土经验资料的解释[J].中国青年研究,2009,(4).
- [27]伊庆春.台湾从业母亲的孩子照料安排[A].周颜玲等主编,王金玲等译.全球视角:妇女、家庭与公共政策[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